

《论语·子罕》“止吾止也”诸说平议^{*}

史文磊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提 要 关于《论语·子罕》“止吾止也”“进吾往也”这两句的理解,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在梳理历代训释谱系的基础上,主要从语法的角度对“建功宜笃”“为仁由己”“唯义与比”三说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建功宜笃”和“为仁由己”两说均难成立,“唯义与比”说是最能站得住的。本文提出的“吾”“我”之别的句法表现这一思路,还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其他经典例句,如《庄子·齐物论》“吾丧我”。文末提出,训诂学中加强语法尤其是句法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 止吾止也 吾 我 焦点 话题

《论语·子罕》9.19 章:“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① 关于“止吾止也”“进吾往也”这两句的理解,历来有不同看法。近年来,杨逢彬(2016)和蒋绍愚(2018)对此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本文在梳理既有训释谱系的基础上,将诸家观点概括为“建功宜笃”“为仁由己”“唯义与比”三说,并主要从语法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辨析。

1. 建功宜笃

1.1 诸说

“建功宜笃”是说建功宜进不宜止,突显行为的笃定和有恒。这一讲解强调“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分析性词汇语法特征的历时演变研究”(21BYY032)、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基本词汇历史演变研究”(16JJD740015)的阶段性成果。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王连旺博士的帮助,初稿曾给汪维辉老师看过,谨此致谢。

^① 朝鲜平壤贞柏洞本《论语》只保存了《先进》《颜渊》等篇,《子罕》篇未存。定州汉墓竹简本存有《子罕》篇,但此章未存。其他版本,如唐抄本《论语郑氏注》及传世各本,皆存此章,且行文一致。

对别人‘止’和‘进’的态度”(参看蒋绍愚,2018:50),“此孔子所以决去就也”^①。

该说由来已久,目前所见早期的几位注家均持此说。何晏《论语集解》(参看阮元校刻,1980:2491)引包咸注:“【譬如为山……】……此劝人进于道德也。为山者其功虽已多,未成一篲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见其志不遂,故不与也。”引马融注:“【譬如平地……】平地者将进加功,虽始覆一篲,我不以其见功少而薄之也。据其欲进而与之也。”郑玄注(参看王素编著,1991:107):“【譬如为山……】……以言有人君为善政者,少未成匮而止,虽来求我,我止不往也。何者?人之解(懈)倦日日有甚也。【譬如平地……】……以言有人君为善政者,昔时平地,今而日益,虽少行进,若来求我,我则往矣。何者?君子积小以成高大也。”皇侃《论语义疏》曰:“【譬如为山……】此戒人为善垂成而止者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则善事不成。如为山垂足唯少一笼土而止,则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笃,与不作无异,则吾亦不以其前功多为善。如为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譬如平地……】此奖人始为善而不住者也。譬于平地作山,山乃须多土,而始覆一笼。一笼虽少,交是其有欲进之心可嘉。如人始为善,善乃未多,交求进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胜于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宋代以降,从此说者仍较多见,如邢昺《论语注疏》(参看阮元校刻,1980:2491)、陈祥道《论语全解》^②、翟灏《四书考异》^③、刘宝楠(1990:350-351)等。

近代日本学界亦不乏持此观点者,如冈白驹《论语徵批》(参看高尚榘主编,2011:492)、东条弘《论语知言》(参看关仪一郎编,1926:286)、安井息轩《论语集说》^④、照井全都《论语解》^⑤等,皆是。

1.2 平议

建功宜笃说有一些平行语例可作类比。《盐铁论·西域》:“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为山,未成一篲而止,度功业而无继成之理,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不过,《盐铁论》这里也有可能是断章取义。《汉书·礼乐志》:“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颜师古注:“言为山欲成,尚少一匮之土,止而不为,则其功终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颜注和建功宜笃说接近。但是,《汉书》及颜注未必就是孔子这句话本来的意思。

① 参看〔日〕安井息轩《论语集说》,嚶嚶舍藏版,日本明治壬申(1872年)季秋刻,卷三 25 页。

② 参看(清)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6册卷五 8-9 页。

③ 参看(清)翟灏《四书考异》,谢家禾跋、卢文弨校,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刻本,“条考十一·论语子罕”9 页。

④ 参看〔日〕安井息轩《论语集说》,嚶嚶舍藏版,日本明治壬申(1872年)季秋刻,卷三 25 页。

⑤ 参看严灵峰编辑《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15函第二册 198 页。

翟灏《四书考异》^①引《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及《荀子·宥坐》“如坳而进”二例为证,支持建功宜笃说。刘宝楠(1990:350-351)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坳而进……’即此章异文。《孟子·尽心》篇:‘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大戴礼·劝学》^②云:‘……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镂。’二文并与此章义相发。《注》簣土至兴也……见其志不遂故不与者,明已设教,当观其志能遂与否,若见志不遂,则其功终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复与之也。”但《旅獒》和《宥坐》等句意也未必跟《子罕》本章是一致的。

蒋绍愚(2018:51)从语法的角度提出,“《宥坐》与《论语》本章实际上是不同的”,“《宥坐》说‘吾已矣’,《论语》本章说‘吾止也’。用‘矣’和用‘也’是不同的。‘××,××矣’是一个条件复句,是说在什么条件下会有什么行动”,“‘××,××也’是一个表原因的复句,后一个小句说明前一个小句的原因”。不过,根据我们考察,古汉语“××,××也”除了可以是表原因的复句之外,也可以是一个条件复句。《论语》中的例子如:

- (1)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 (2)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 (3)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
- (4)夫子怃然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左传》中也有一些例子,如:

- (5)夫概王曰:“……今日我死,楚可入也。”(《左传·定公四年》)
- (6)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左传·文公七年》)
- (7)子皮曰:“……微子之言,吾不知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8)子西怒曰:“……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吕叔湘(1982:274)说:“‘矣’字表变动性的事实,‘也’字表静止性的事实。”即是说,“矣”“也”之别可能不是表现在能否用于条件复句之主句上,而是表现在用于何种语义的主句上。

我们是不赞同建功宜笃说的。这种诠释最大的问题,是跟原文的字面意思离得太远,难以弥合。对此蒋绍愚(2018:50)已经有所提及,我们表示赞同。原文是“吾进也”和“吾往也”,可何晏用“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不与”(引包咸)和“不以其见功少而薄之”“与之”(引马融),郑玄用“虽来求我,我止不往”和“若来求我,我则

① 参看(清)翟灏《四书考异》,谢家禾跋、卢文弨校,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刻本,“条考十一·论语子罕”9页。

② 按,此是《荀子·劝学》之文,非《大戴礼·劝学》。

往矣”，皇侃用“不美其前功多”和“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分别加以解释。我们认为对经典语句作义理的阐发，至少要尊重原文的字面意思，而这样的阐释很难还原回原来的字面意思。因此，建功宜笃说尽管很早，但未必符合孔子这句话的原意。这很可能是后人为了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包咸“进于道德”，马融“为善政”，郑玄、皇侃“为善”）而进行的义理发挥。

2. 为仁由己

2.1 诸说

“为仁由己”强调止或进的原因在我自己，而非其他因素使然。杨伯峻（1980：93）说这“便是‘为仁由己’的意思”。“为仁由己”语出《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杨逢彬（2016：181）认为该说“为皇侃《义疏》、邢昺《疏》和朱熹《集注》之说”。但据我们考察，皇侃、邢昺尚无“为仁由己”的理解；此说最早见于朱熹（1983：114）：“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进者，吾自往耳。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①蒋绍愚（2018：50-51）说，《论语集注》“是说‘止’和‘进’的原因，为善而止，是因为我自己停止，为善不止（进），是因为我自己前往”。我们觉得这一概括不够全面。从这段注解我们得知，朱熹其实是将建功宜笃（“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和为仁由己（“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两种观点合在一起说的，或者说是在继承旧说的基础上，加上了为仁由己的新说，而不是只强调原因（即为仁由己）。

朱熹的解释影响极大，此后有很多人跟着他说，即把新旧两说合在一起说，如张栻《癸巳论语解》^②、戴溪《石鼓论语答问》^③、真德秀《论语集编》^④、郑汝谐《论语意

①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部有一部明刻本《论语详说》，撰者题为宋李纲。该书注曰：“言山成而但少一簣之土，其止者，吾自止耳。……是其止在我而不在人也。……平地而方覆一簣之土，其进者吾自往耳。……是其往在我而不在人也。……大抵进而必曰吾往，乃自强也，止而必曰吾止，乃自弃也。”此说跟朱熹《论语集注》很相似，若真是李纲所撰，那朱熹就不是首创。但据徐潇立（2007）考证，此书并非李纲《论语详说》，而极有可能是明初理学家曹端所撰《四书详说》。

② 参看严灵峰编著《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16函第二册卷五8页。

③ 参看（清）黄群辑《敬乡楼丛书》第三辑之二，民国二十年（1931年）永嘉黄氏校印，卷中16页。

④ 参看（清）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0册卷五10页。

原》^①、郝敬《论语详解》^②、鹿善继《四书说约》^③等,皆是。现代学者如钱穆(2002:254-255)、王熙元(1981:505-506)、李零(2007:185)、孙钦善(2009:113)等,亦然。

有人偏重原因方面的解读,这样就发展出专门的为仁由己的观点。如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④说:“此章总以自平地为山设喻。或为山将成,尚亏一篑而止者,或尚是平地,方覆一篑而进者,其进其止,由其己心,非人所能与也。”黄式三《论语后案》^⑤则更进一步,说“吾止、吾往,吾犹己也。《集解》误”;他认为“止吾止也”“进吾往也”的行为主体是一致的,强调“我自己”。蒋绍愚(2018:50)说:“本章的‘吾进也’和‘吾往也’是用来说明原因的,《论语集注》的解释……是正确的。”

日本近代学界也有不少人依照朱说,如伊藤仁斋《论语古义》^⑥、广濑建《读论语》^⑦等。但也有人明确反对朱说,如东条弘《论语知言》(参看关仪一郎编,1926:286)说:“《注》:‘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皆误解。”安井息轩《论语集说》^⑧说:“《集注》止进二字下属为句,语意反晦。”

2.2 平议

我们认为为仁由己说是不符合语言表达的事实。下面试作申述。

“止,吾止也”“进,吾往也”在逻辑关系上都是条件复句,这一点大家的理解是一致的。“止”“进”是条件从句,“吾止也”“吾往也”是主句。我们调查发现,《论语》的条件复句中,主句的主语如是第一人称代词,一律用“吾”不用“我”,共10例。例如:

(9)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

(10)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成书年代和地域上跟《论语》接近的《左传》,在这种位置上也是用“吾”不用“我”,共26例。例如:

① 参看(清)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9册卷二27页。按,四库全书本作“止曰吾止,进曰吾往。作辍成否,岂系乎人哉?特在吾一念尔”。严灵峰“进曰吾往”作“往吾往也”(参看严灵峰编著《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16函第一册卷二25页)。

② 参看(明)郝敬《论语详解》,明万历戊午(1618年)京山郝氏刻本,卷九36-37页。

③ 参看(明)鹿善继著,卢兆隆、郭卫明订《四书说约》,清道光甲辰(1844年)善化贺长龄重刻,“上论”卷九9页。

④ 参看严灵峰编著《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16函第二册卷五6页。

⑤ 参看(清)黄式三《论语后案》,清道光甲辰(1844年)活字本,“子罕九”20页。

⑥ 参看〔日〕伊藤仁斋著、佐藤正范编《论语古义》,简野道明氏所藏,日本东京合资会社六盟馆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发行,卷五186页。

⑦ 参看严灵峰编著《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28函28页。

⑧ 参看〔日〕安井息轩《论语集说》,嚶嚶舍藏版,日本明治壬申(1872年)季秋刻,卷三25页。

(11) 苟舍我,吾请纳君。(《左传·庄公十四年》)

(12) 捷,吾以女为夫人。(《左传·庄公十年》)

《左传》中有些条件分句带有祈使的语气。祈使和假设条件具有天然的联系,言者让听者怎样,隐含着如果听者怎样,就如何如何。这时主句主语同样用“吾”不用“我”,共7例。例如:

(13) 活我,吾与女璧。(《左传·哀公十七年》)

(14) 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左传·晋公十三年》)

《左传》中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如下:

(15) 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左传·哀公十一年》)

(16) 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17) 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这三个例子都是条件复句,主句的主语却用“我”不用“吾”。但辨析发现,这几例有一个共性,即主语“我”都处在对比焦点的位置上。例(15)主句和从句的主语“我”“尔”形成对比,这时主语占据对比焦点位置。例(16)主句中有焦点关联词“则”,左向关联主语为焦点,强调“我”。例(17)的语境是,国人都怕督戎,没人敢去杀他。斐豹说:“苟焚丹书,我杀督戎。”这里“我”和前文语篇中的“国人”形成对比,即国人无一敢去,我去,所以“我”仍应解读为对比焦点。

而考察前文用“吾”的例子发现,主句的主语都不是焦点解读。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规律:《论语》《左传》等上古文献的条件复句中,主句的主语如用“吾”,则不能承载焦点,如用“我”,则要承载焦点。

至于为何如此以及上古汉语主语位置上的“吾”“我”之别,因本文主旨和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开,只能略微一说。条件复句中,条件从句具有话题属性(参看 Haiman, 1978; 徐烈炯、刘丹青, 1998)。根据我们调查,上古汉语句中如已另有话题,句子的主语一般就不再承载焦点和话题了。也就是说,这时只能使用弱式的“吾”,而不能用原式的“我”了^①。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再来看为仁由己说的的问题。该说是一个条件复句中的焦点解读,杨伯峻(1980:93)的译文“是我自己……的”颇具代表性,其中“是……的”正是典型的焦点结构,对比焦点落在第一人称代词主语上。然而,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时的焦点解读一定要用“我”不用“吾”。而这里用“吾”,则一定不能是焦点解读。

^① 详参史文磊、刘莹《从信息结构的句法表现看上古汉语“吾”“我”之辨》(待刊)。

即是说,“止,吾止也”“进,吾往也”两句断非“是我自己停止/前往的”这样的焦点解读。

3. 唯义与比

3.1 诸说

“唯义与比”是说该止则止,该进则往。杨伯峻(1980:93)说,这“便是‘唯义与比’的意思”。“义”表示道义、应该。“唯义与比”语出《论语·里仁》“义之与比”。

杨逢彬(2016:181)认为该说“为何晏《集解》所引包咸、马融之说”。但据前文辨析可知,包、马之说还没有唯义与比的意思。据我们考察,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的张载(参看朱熹,1986:216):“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颜渊进未止,且与互乡之进也。”不过,张载在此是将“为山”“平地”拆开分别讲解的。“仲尼所以惜颜渊进未止”对应“为山”句,语出《论语·子罕》:“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是说颜渊好学,只知进而不知止,结果英年早逝,孔子感到惋惜,换个角度说就是主张“当止则止”,即唯义与比。“与互乡之进”对应“平地”句,语出《论语·述而》:“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这是说孔子对互乡童子当下进取之举予以赞许。比张载稍后的杨时则明确表明了唯义与比的看法:“未成一簣止吾止者,时止则止也。虽覆一簣进吾往者,时行则行也。亦各当其可而已矣。”(参看朱熹,1986:216)

3.2 平议

蒋绍愚(2018:50)认为这种讲解“在‘止’和‘进’前面加了[应该]”,“和原文有距离”,“阅读古书有时可以加一些字来理解,但能不加则尽量不加”。杨逢彬(2016:181-182)则赞成唯义与比说,并说:“《荀子·宥坐》:‘如坳而进,吾与之;如丘而止,吾已矣。’……意为:‘即使刚堆了一小撮土,如果应该继续,我赞同这样做;即使堆成了一座山,如果应该停止,我也会停下来。’……《孟子·公孙丑下》:‘……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后三句杨伯峻先生译为:‘反躬自问,正义确在我,对方纵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

前文提到清代翟灏《四书考异》^①和刘宝楠(1990:350-351)曾引《荀子·宥坐》“如坳而进”这一句来支持建功宜笃说。但是,以往的注家对于这一句该怎么理解,并无明文注释(参看董治安等汇撰,1997:948)。我们觉得杨文的解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若是如此,《论语》“止吾止也”句在“止”前加[应该]的解读,就不是孤例,

^① 参看(清)翟灏《四书考异》,谢家禾跋、卢文弨校,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刻本,“条考十一·论语子罕”9页。

此其一。其二,“止吾止也”这类句子中[应该]的解读不必认为是“增字为训”,而可以认为是情态词承语境缺省。因为在上古汉语里,很多情况下情态义是在语境中解读出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的理解是倾向于唯义与比的。

4. 结论和余论

本文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对《论语·子罕》“止吾止也”“进吾往也”句历来的训释谱系作了较为细致的整理和辨析。梳理清楚《论语》每一章训释的历史继承和创新发展,无论是从语言文字之学论,还是从经学与义理之学论,都是一项非常必要且有价值的工作。第二,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诸家观点做了进一步的检讨和辨析。建功宜笃说跟原文的字面意思离得太远,为仁由己说不符合条件复句中主句主语的句法要求。相对而言,唯义与比说是最能站得住的。

关于《论语》此例涉及的“吾”“我”之别,有必要多说几句。就笔者目力所及,只有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古学派的东条弘^①曾从“吾”“我”之别对朱熹的“为仁由己”说作过辨析,实属难能可贵。东条弘《论语知言》(参看关仪一郎编,1926:286):“按,吾,夫子自吾也。朱子不知吾我之别。……《注》:‘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皆误解。”但是,东条氏在此并未详说“吾”“我”是怎样的区别。我们翻阅了《论语知言》,在其他两处注解中找到了更加详细的阐述。《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知言》(参看关仪一郎编,1926:146):“按,我与彼对,吾与夫对,故吾人、夫人,吾子、夫子。古者未睹其言我人、彼人,我子、彼子,则吾我之别远矣。按,我、人,吾、人,皆对言。此子贡就交际人情言。起头我,泛指人言;下文人,指他人言;称吾单指己。此章上下两语,上我对下句吾言。”《论语·述而》:“窃比于我老彭。”《论语知言》(参看关仪一郎编,1926:201)曰:“我与吾不同。吾与夫对,夫子、吾子,夫人、吾人之类。是夫尊辞,吾亲辞。未见以我为亲辞者也。此曰我者,孔子亦商人故也。”东条氏认为“吾与夫对”,“吾单指己”,“吾亲辞”。据此可见,尽管东条氏已从“吾”“我”之别来鉴别“为仁由己”说的优劣,但他提出的“吾”“我”之别是站不住的。而我们提出的鉴别标准,是建立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的。

“吾”“我”之别的句法表现这一思路,还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其他经典例句。

^① 据关仪一郎、关义直(1966:336)“东条一堂”条,东条弘号一堂,“業を皆川淇園に受く。……その學専ら宋學を斥け、考據によりて聖經の原意を發揮することにある”。(受业于皆川淇园。……其学专斥宋学,以考据发微经典原意。)

例如:

(18)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庄子·齐物论》)

“今者”是表时间的附加性成分作话题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句子主语如是第一人称代词,用“吾”不用“我”。除非第一人称代词主语承载焦点,但这里不是。所以该句主语用“吾”不用“我”,正是句法规则使然。而上古汉语动词后的宾语如是第一人称代词,一定用“我”不用“吾”,所以这里宾语用“我”,也是句法上的要求。这样一想,“今者吾丧我”为什么一句话前用“吾”后用“我”,就解释得通了。

蒋绍愚(1997:20)说:“语言是一个系统。词汇、语音、语法是密切相关的。……在训诂学研究中如果忽视语法,就会出现许多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训诂学研究所必须注意的。”汪维辉(2018:85)归纳训诂的十条基本原则,第七条即是“通语法”:“借助语法分析可以有效地确定词义。”结合本文所论,在训诂学中加强语法尤其是句法的研究,的确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 [宋]朱熹(撰) 1983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 [清]刘宝楠(撰) 高流水(点校) 1990 《论语正义》,中华书局。
- [清]阮元(校刻) 1980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 [清]永瑢等(编纂) 1986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 董治安 郑杰文(汇撰) 1997 《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
- 高尚榘(主编) 2011 《论语歧解辑录》,中华书局。
- 黄怀信(主撰) 周海生 孔德立(参撰) 2008 《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 蒋绍愚 1997 《语法学与训诂学》,《古汉语研究》第3期。
- 蒋绍愚 2018 《论语研读》,中西书局。
- 李零 2007 《丧家狗——我读〈论语〉》,陕西人民出版社。
- 李泽厚 1998 《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
- 吕叔湘 1982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钱穆 2002 《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孙钦善 2009 《论语本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汪维辉 2018 《训诂基本原则例说》,《汉字汉语研究》第1期。
- 王素(编著) 1991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
- 王熙元(编著) 1981 《论语通释》,台湾学生书局。
- 徐烈炯 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蒲立 2007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论语详说〉作者考辨》，《中国学研究》第 10 辑，济南出版社。
- 严灵峰(编著) 1966 《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
- 杨伯峻(译注) 1980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 杨逢彬(著) 陈云豪(校) 2016 《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日]关仪一郎(编) 1926 《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论语部 6》，东洋图书刊行会。
- [日]关仪一郎 关义直(编) 1966 《近世汉学者传记著作大事典(附系谱年表)》，日本琳琅阁书店。
- Haiman, John 1978 Conditionals are topics. *Language* 54.3: 564-589.

(责任编辑:张 阳)

第七届文献语言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第四届文献语言学青年论坛顺利召开

2022 年 6 月 17-19 日,第七届文献语言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第四届文献语言学青年论坛在郑州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文学院、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会议采取线上形式进行,来自国内外 100 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30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6 月 18 日,主论坛开幕式由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郑州大学市委常委、副校长韩国河,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贵生分别致辞。主论坛共举办 5 场大会报告,中国、日本和韩国 28 位知名专家作主题演讲。另有 144 位专家学者分 16 组进行小组讨论,对相关论题进行充分交流。论文研究材料涉及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域外文献等,既有微观的字词考证,也有宏观的理论建构,涵盖了文献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基于传世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基于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汉字理论与汉字史研究等多个重要领域。6 月 17 日,还举办了青年论坛,72 位青年学者宣读论文,最终评选出 12 篇获奖论文。会议历时 3 天,报告氛围热烈,小组讨论充分,与会专家总结并盘点当前文献语言学的最新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会议成果丰硕,对于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从理论、方法、技术与实践等方面推进文献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悉,下届论坛将由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